

# 艾丽丝·门罗作品中的女性生存主题分析

朱翠云,屈彩娥

(延安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独特而具有象征意义的中心主题。加拿大文学,乃至加拿大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主题即是“存活”。作为当代加拿大文学的经典作家之一,艾丽丝·门罗将她的视角聚焦于平凡小镇上普通人的情感体验和心路历程,尤其是处于生存困境中的女性。这些女性以顽强的意志和忍耐力在各种生存困境中得以幸存。通过描写女性的生存状态,门罗建构了一个又一个独具特色的“她”的生存故事。

**[关键词]**生存主题;女性;门罗;加拿大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5)05-0089-05

## Analysis of Women Survival in Alice Munro's Works

ZHU Cuiyun, QU Cai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an University, Yan'an, Shanxi, 716000, China)

**Abstract:** Every culture has its own unique and symbolic central theme. As for Canadian literature, even the national culture,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ymbol of survival. Alice Munro,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ntemporary Canadian literature, mainly focuses her works on the regional lives in the area of southwestern Ontario, especially women who are in the constant struggle of life. These women survive the plight of life on their persistence and endurance. By describing the survival state of women, Munro creates “her” unique stories of survival.

**Key words:** survival the me; female; Alice Munro; Canada

随着加拿大国家的成立,加拿大文学逐渐摆脱殖民主义思维,开始创建具有加拿大特点的文学体系,但殖民心态对加拿大文学的巨大影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同时,加拿大严苛的自然环境所构成的地域影响,使加拿大文学从一开始就需要在夹缝中求生存,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即是一种心理上和物质上的局限意识。加拿大文学批评大师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 1912—1991)就曾把加拿大文学的这种独有心理称之为“要塞心理”(garrison mentality)，“要塞的内部是拥挤的文明,外部则是广袤的荒原”。<sup>[1]</sup>加拿大人历来强调小镇文化的重要性,而对于荒野却始终心怀敬畏,甚至是敌意。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则在其文学评论《幸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中进一步指出加拿大文学具有

核心象征意义的主题“毫无疑问该是‘存活’”。<sup>[2]</sup>加拿大的早期文学始终围绕着人类为谋求生存与大自然艰苦抗争的主题。而随着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当荒野不再具有威胁性时,人们又开始把目光关注于人们心理层面的生存。这种隐忍妥协求生存的心理始终存在于加拿大人的集体无意识中,也是加拿大文学,甚至加拿大文化的一个重要主题。

作为加拿大文学的经典作家之一,艾丽丝·门罗以她细腻的笔触、独特的人文感知继承了加拿大文学的这种“要塞心理”,她的作品也始终关注着小镇生活中普通人的悲欢喜乐,而“主题常常是年轻女性在与家庭和小镇发生冲突后委曲求全而导致的苦恼和困境”。<sup>[3]</sup>门罗笔下的女性真实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她们生活中的无奈、困惑与挣扎

收稿日期:2015-05-19

作者简介:朱翠云(1989-),女,湖南湘潭人,延安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都在门罗细腻的笔触下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门罗被瑞典文学院称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至今出版了14部短篇小说集。在获诺奖之前,门罗也已经是获奖无数,其中包括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美国国家书评人奖,以及曼布克国际文学奖等等。她的作品被翻译成13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然而,作为一名只专注于写短篇小说的作家,门罗的作品曾常常受到冷遇,门罗的获奖也被各大报刊杂志爆为“冷门”。但随着加拿大文学的兴起,门罗的获奖,国内外的文学研究评论者也重新把目光聚焦在这位看似边缘的女作家身上。现有的门罗研究主要集中于对门罗作品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以及加拿大性研究等。关于门罗研究的硕博士论文近几年也不断出现,其中较为突出的有周怡的博士论文《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的加拿大性研究》以及硕士论文《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艾丽丝·门罗的〈逃离〉》《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叙事研究》以及《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解读〈姑娘们和女人们的生活〉与〈逃离〉中的逃离历程》等等。在这些研究中评论者们无疑都注意到了门罗独特的女性主义视角对人物的心理揭示,却少有著作将门罗作品中所反映的存活主题,尤其是女性存活主题,全面而细致地加以罗列与归纳。本人拟从女性的存活主题出发,来分析门罗作品中反映的加拿大文学特点。

## 一 女性的生存困境

艾丽丝·门罗对于加拿大生存主题的探讨突出地表现在女性为自身存活所做出的各种努力上。从另一方面来说,加拿大民族文化中的边缘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女性的“他者”身份有着共通之处。正如刘意青指出“自20世纪中叶起,加拿大的确存在一个别处没有的女小说家群体,她们在表现加拿大独特的存活主题,特别是女人为存活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的斗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作为一名女性作家,门罗善于从女性的视角来表现女性对待婚姻,家庭,爱情,以及自我等方面遇到的困惑和挣扎,并揭示她们微妙的情感变化和心理成长。

在《漂流到日本》中,女主人公格丽塔遭遇了来自女性主体意识,伦理以及母女关系的三重危机。题名“漂流到日本”来自格丽塔写给“准情人”哈里斯的一封信:“写这封信就像把一张纸条放进漂流瓶——/希望它能/漂流到日本”。<sup>[5]11</sup>漂流瓶的意象似乎也预示着结局的开放与不确定性。故事一开始,格丽塔带着女儿凯蒂在火车站与丈夫彼得挥手告别。这似乎是最普通的三口之家,一对夫妻以

及一个可爱的女儿。然而,在看似平静的表象之下却是夫妻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彼得是工程师,他对于文学艺术包容而不加干涉。而格丽塔在作为一名家庭主妇的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在彼得看来文学艺术不过就是消遣的东西,不值得拿来作严肃的讨论,其实用价值也远远比不上一座桥梁。而格丽塔对待文学艺术的态度却是一丝不苟的。“因为她是诗人,而她的诗里有些东西绝不是令人愉快的,也不容易阐释。”<sup>[5]3</sup>这意味着丈夫并不能从心底里认同和欣赏妻子的行为,文学艺术和女性被一同排除在了男性主流意识之外了。女性和文学艺术的这一层隐秘联系激发了格雷塔的女性主体意识,她纠正彼得对自己“女诗人”的称呼,却无法改变周围人们对于女性以及文学艺术的偏见。“甚至只是读一本真正的书,都会让人感到可疑,怀疑这与你的孩子得了肺炎有关系……”<sup>[5]4</sup>“准情人”哈里斯是格雷塔在一次偶然的作家聚会上认识的记者。由于不被人熟识,格雷塔在聚会上又一次饱尝了被排挤的滋味。在她苦闷之际,哈里斯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并送其回家。哈里斯的出现犹如给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格雷塔带来了一线生机,格雷塔由此迷恋上了他,并计划着与他在多伦多的相聚,这是格雷塔对传统家庭伦理的第一次背离。而第二次背离发生在去多伦多的火车上,格雷塔遇见青年演员格雷格,并与之发生了实质上的关系。当她返回车厢后,发现女儿不在车厢内,她心急如焚,女儿的失而复得让她意识到了作为母亲的责任。当她下定决心要为女儿放弃一切时,哈里斯的再次出现又给整个故事罩上了一层迷雾。女儿凯蒂最后的表现很耐人寻味:“她试图抓紧凯蒂,但就在这孩子挣脱了她的手,走开了。她没有试图逃开。她只是站在那里,等着接下来一定会发生的任何事。”<sup>[5]26</sup>凯蒂和格雷塔的对立又使她陷入了母女关系的困境中。这三重危机环环相扣又互为因果,把作为女性的格雷塔压得透不过气来。小说的开放性结局指向未知,但可想而知,要想解决自己的生存困境格雷塔就必须做出妥协与让步。

## 二 女性的生存策略

门罗对于女性未来出路问题的探讨远没有女权主义者来得激烈和彻底。在门罗的作品中,女性虽然遭受层层生存危机,但她们总是会以一种包容的姿态试图与这个世界达成和解。“门罗写女性,并且在为女性争得一些权益或自由,但是她并不特别强烈。”<sup>[6]</sup>门罗在一次访谈中也说到:“有人还是认为女人会找到生活出路的。从前,结婚就是出

路。近年来,离开丈夫成了出路……我没有这样的出路。在我看来,这样的出路很可笑。我的出路只是过日子,活下去……”<sup>[7]</sup>“活下去”成了门罗作品中的生存原则,也是女性选择在夹缝中求生的生存策略。《我妈的梦》《逃离》和《孩子们留下》三篇故事表现了门罗对现实的深刻洞悉并升华出一种务实的生存哲学。

在《我妈的梦》中,母亲吉尔原本是个即将毕业的音乐学院的学生,对拉小提琴有执着的热情。意外的怀孕让她不得不终止学业,停止小提琴的演奏。她原本以为妊娠的结束意味着这种状态的终止,却没想到伴随婴儿出生的是永无休止的哭闹和女儿对小提琴的敌意。“我们彼此都是对方的恶魔。吉尔和我。”<sup>[8]348</sup>作为叙述者的女儿“我”对于母亲吉尔的拒绝同样映射出吉尔对母亲身份的厌弃。女儿的出生似乎成为吉尔追寻艺术家梦想的一个绊脚石。女艺术家和女性身份的永恒矛盾再一次在门罗作品中得以重现。然而在一次梦境中吉尔终于意识到孩子的重要性和作为母亲的责无旁贷,她与女儿最终达成了和解。“对我而言,似乎只有在那时,我才变成了女性。我知道这事在我出生之前很久就注定了……可我相信只有在我决定醒来,在我放弃与妈妈的抗争的那一刻,以及我事实上选择了生存而非胜利(所谓胜利也就是死去)的那一刻,我才拥有了我的女性身份。在某种意义上,吉尔也因此获得了她的女性身份。”<sup>[8]346</sup>女性由于自身的生理特质,必然需要承担作为女儿与母亲的身份。对这两种身份的抛弃均不能构成完整的女性主体身份。对于母亲身份的接受不但没有阻碍吉尔的事业反而成就了更为完整的自我。吉尔顺利毕业了并且用拉小提琴赚的钱养活了自己和女儿并终身从事着艺术家的工作。在这个故事中,门罗显然放弃了女权主义将女性主体与女性的家庭和社会身份一分为二的二分法,而是探求一种更为合理的女性主体身份。女性在处理其主体身份危机之时,显然是有一种更为现实、更为理智的“第三条道路”。

《逃离》中,女主人公卡拉的命运似乎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七月异常的持续阴雨天气以及山羊弗洛拉的突然走失都给卡拉的心头笼上了一层阴霾,而丈夫克拉克对自己的冷漠与无理要求更是让卡拉无法忍受,甚至萌生了出逃的想法。卡拉天性就爱与动物和自然为伍,她的第一次出逃就是为了逃离母亲与继父住的高档住宅区,选择与克拉克生活在农庄,与动物为伍。“我一直感到需要过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sup>[9]33</sup>她在写给母亲的信上

这样说道。与克拉克在经营马场的过程中,和山羊弗洛拉之间更是产生了某种莫名的认同感。每当卡拉对生活感到沮丧时,弗洛拉“那双黄绿色眼睛里闪烁着的并不完全是同情,倒更像是闺中密友般嘲讽的神情。”<sup>[9]8</sup>自然和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从属地位使得二者自然而然地被联系到了一起。弗洛拉的出逃在一定意义上也预示着卡拉的逃离。但是就像弱小的弗洛拉无法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一样,卡拉也无法独自在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中存活。最终,二者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回归。弗洛拉永远的失去了,而卡拉却顽强的生存了下来。尽管自然仍在时时召唤着卡拉,但卡拉明白要想在社会中存活,就必须着眼于现在的生活。“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卡拉不再朝那一带走了。她抵抗着那样做的诱惑。”<sup>[9]47</sup>在门罗的作品中,作为被征服和占有的对象,女性与自然常常被联系到一起。女性要在强大的男权体系中存活,就必须着眼于现实,而非寄存于想象。

《孩子们留下》是门罗笔下另一个关于母亲和孩子的故事。女性为逃离家庭以及社会为她们既定的固定形象和生活模式,她们通常会选择做一些看似勇敢,实则冲动、愚蠢的行为,例如选择一个错误的人私奔或是在最后一秒拒绝一个正确的人。为此,女性常常要付出惨重甚至一生的代价。与前两个故事不同,年轻妈妈鲍铃与情人杰弗里私奔,选择了逃离,由此被迫与原有的一切断绝关系,甚至是两个年幼的女儿。“孩子们留下”是丈夫布莱恩在得知妻子与情人出走后提出的唯一要求,并试图以此来惩罚鲍琳。鲍琳自此不得不长期忍受与孩子分离的痛苦。她原以为她与杰弗里的恋情就像他们排演的戏剧《欧律狄刻》里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的爱情一样是命中注定,选择了杰弗里生活将会有所不同,直到她的孩子们长大后和她聊起当初的那段往事,她才淡淡地说起“那不是俄耳甫斯……是另一个跟这戏有关的人。我和他过了一阵子。”<sup>[8]227</sup>杰弗里终究不是她的俄耳甫斯。当初所谓的爱情转瞬即逝,而她将永远错过的却是陪伴孩子们成长的时光。“她的孩子们都长大了。她们并不恨她——因为她的离开,或是不回来——她们也不原谅她。”<sup>[8]226</sup>由此可以看出,小说的题目包含有两层看似矛盾却又内在联系的意思。一方面,孩子们的确被留下来与父亲布莱恩一起生活;从另一方面来说,孩子们也永远地留在了母亲鲍琳的心里,即不能陪伴孩子一起成长的愧疚与悔恨成为了鲍琳一生的负担。门罗从反面论证了女性逃离婚姻、逃离家庭并不是一切苦难的结束,相反或许是更大

灾难的来临。女性要求得自身的解放,不仅仅是逃离婚姻这么简单,一段婚姻的结束往往也就意味着社会关系的瓦解。

### 三 建构“她”的生存故事

门罗在获得诺奖以前,在国内一直被冠以“边缘作家”的称号,仅有一本引进译著《逃离》,其销量也远不及同类型的其他长篇小说。门罗的三个标签“地域性作家”“短篇小说家”和“女性作家”使得她的作品迟迟未能进入中国主流评论家和大众读者的视野。评论家们习惯于将门罗的写作特色与契科夫、欧·亨利以及曼斯菲尔德等知名作家的作品特色归为一类。这在一定程度上既褒奖了门罗的艺术功底,却也模糊了她与其他作家的区别。门罗擅长写小镇生活,写短篇小说,写她所熟知了解的关于女性的一切。然而,门罗的作品却早已挣脱地域、短篇和女性的局限,上升到一个普世性的高度。通过构建加拿大普通女性的生存故事,门罗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她”的短篇小说写作风格。

《播弄》是短篇小说集《逃离》中的倒数第二个短篇,讲述了在命运的播弄下一场错失了四十年的姻缘,一个迟来的真相。小说中,门罗运用反讽性的互文手法将莎士比亚的三部戏剧穿插于故事情节的发展之中,以达到琳达·哈钦定义的双重目的,即:“表明……一种断裂,或者至少是颠覆或批判(原始)文本”,同时,“在读者中建立……一种连续性的话语,从而表达出一种解释性的连续”。<sup>[10]</sup>读者不仅可以找到两种文本的相似之处,又可以挖掘到现有文本对原始文本的具有反讽意味的颠覆。不同于契科夫的辛辣,门罗的反讽更带有一种人文主义的关怀。戏剧的存在给琐碎无奇的日常生活蒙上了一层浪漫色彩,也预示着男女主人公戏剧般的爱情经历。女主人公若冰每年夏天都会乘火车去临镇斯特拉特福看一场莎士比亚的戏剧。第一年她看的是《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戏剧能使她暂时摆脱现实生活的烦扰,让她觉得“即将回到里面去的那种看来是那么临时将就不能令人满意的生活,只不过是一个短短的插曲,是能轻松忍受下去的。”<sup>[9]225</sup>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一个是罗马英雄,一个是埃及艳后,他们的爱情炙热而具有毁灭性,正如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丹尼洛的异域背景更是贴合了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跨国情缘。戏剧与小说在门罗的笔下被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一方面,读者可以通过戏剧猜测小说情节的发展;另一方面小说情节对戏剧的颠覆又能

增大小说的悲剧意味。第二年上演的戏剧是《皆大欢喜》。《皆大欢喜》是莎士比亚的四大喜剧之一,剧中肯定了人们对爱情和幸福的追求,男女主角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然而戏剧毕竟与现实生活不同,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偶然性导致事件不能如预想中的那般顺利进行。若冰的满腔热诚换来的却是一个错愕的恋人和一张重重关上的大门。这一戏剧性的反讽增大了人物的心理落差感,增强了小说的戏剧冲突与内在张力。

此外,小说中双生子的意象直接影射了莎士比亚的另一部戏剧《第十二夜》。小说的第二部分直接转接到四十年后,若冰在一次日常的医疗护理中,再一次发现了那张熟悉的脸,并最终得知了隐藏了四十年的真相:她当年见到的并不是丹尼洛,而是丹尼洛的双胞胎聋哑兄弟。“莎士比亚应该使她思想上有所准备。在莎剧里,双生子经常是误会与灾难的起因。”<sup>[9]285</sup>然而,小说中的疑团与误会并没有如戏剧《第十二夜》中一般得到完美解决,一转身的瞬间已成为一生的错失。戏剧与小说之间彼此映照又互为反讽。故事发展到这里,似乎是要以一个欧·亨利标志性的结尾结局。然而门罗的高超技艺表现在她不仅继承了前人的写作手法,而且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和改造了这个结尾。正如曼布克评判小组评论道:“艾丽丝·门罗以短篇小说作家著称,然而她每一个短篇中独有的深度、智慧和精确都堪比大多数小说家的长篇巨著。阅读艾丽丝·门罗每次你都能学习到之前想都未曾想过的东西。”<sup>[11]</sup>门罗通过若冰最后的反思向读者解释了即使没有那次命运的播弄,两人在现实中结合的种种困难。若冰有一个得严重哮喘病的姐姐乔安妮,时刻需要有人照顾;丹尼洛也有一个又聋又哑无法与外界交流的弟弟亚历山大。他们两人的结合势必会导致原本家庭的破裂以及现有矛盾的不可调和。命运的偶然性让人唏嘘不已,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必然性。门罗的结尾表达出一种哲理性的思辨,即尽管命运的偶然性使事件错综复杂,但其始终会朝着必然性的方向前进。穿错的裙子,临时下的一场大雨,被水气毁掉的发式,双胞胎兄弟等等均是必然性中偶然事件。表面上这些事件改变着人们的命运,实际上命运的必然性恰蕴含在这些偶然性事件之中。当若冰想明白这一点,“它使你非常气愤,但是还是会感受到远处传来的温暖,而且丝毫不会有羞愧之感。”<sup>[9]286</sup>门罗的结尾既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又给人以温情脉脉的哲理启示。

门罗以她敏锐而细微的视角探寻到女性的心

理,欲望以及她们用于寻找幸福的各种途径。外人眼中的若冰,更像是她在散戏后在河中看到的黑天鹅“隔开一段距离滑行在白天鹅群的后面,独自觅食。”<sup>[9]</sup><sup>255</sup>门罗对若冰形象的设定是明显带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她爱看别人眼中装腔作势的莎士比亚戏剧,并把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寄托于戏剧之中;同时也不盲目地跟从社会潮流,早早地把自己嫁掉;她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将事业当成兴趣。如同她扮演的海达·盖普勒,若冰反抗着社会赋予她的既定命运。然而,若冰身上反映的女性主义思想并不是那么强烈,她也只是想保存自己独立思想的同时在社会上更好的生存。当人们惊讶于表面上循规蹈矩的若冰将易卜生的海达扮演得十分出彩时,若冰只是将她真实的自己表现在她所理解的角色之中了。旧的生活方式在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跟着变化,但若冰似乎只是忠实于自己。她顺从于社会的运行方式,又在一定程度上坚持着自己的选择。门罗关注女性,关注于女性的生存,却从不将女性主义的条条框框强加于自己的作品之上。

门罗在作品中构建了一个又一个的女性故事,大都讲述了平凡女性在婚姻、家庭、爱情中的困惑与释然,逃离与回归,挣扎与成长。门罗的笔下没有波澜壮阔的战争场景,没有水火不容的家族世仇,甚至没有令人怦然心跳的浪漫桥段,有评论称,“门罗是一个面目模糊、难以定义、非政治化的作家。”<sup>[12]</sup>然而,她对女性生存境遇的把握,对女性生存策略的探析,以及对女性心理的揭示都具有普世性的价值。作为一个专写短篇小说的加拿大女性作家,门罗需要像她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一样在夹缝中求生存。“我不知道我会有那种处在边缘上的感觉,”在一次采访中她说道,“也许是因为我就在边缘中长大。”<sup>[13]</sup>她始终关注于加拿大的普通小镇上以及小镇上普通人的生活。与此同时,门罗也是一位带有加拿大标签的作家,她的作品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加拿大的民族特性。“加拿大为摆脱文化上的次属地位和殖民地思维的抗争与女性为争取独立性别身份所做出的努力类似。”<sup>[14]</sup>由于长期受到法、英两国相继的殖民统治,建国之后,又时时遭受邻国美国强大的文化冲击,加拿大文学乃至加拿大民族都受到这种殖民心态的影响,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我定位的过程。门罗的女性生存故事不仅契合了加拿大的这种民族心理,也表现出为

加拿大文学从边缘向中心过渡的努力。女性、短篇小说和加拿大民族身份统一于“存活”这一主题。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的加拿大作家,门罗不仅为自己笔下以顽强的意志和忍耐力在生存斗争中获得胜利的女性予以肯定,更为加拿大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确立自身特性做出了巨大贡献。

#### 参考文献:

- [1] 周怡. 艾丽丝·门罗:其人·其作·其思[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99.
- [2] Margaret Atwood. *Survival: 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 [M]. Toronto: M & S Inc, 1996: 25.
- [3] 朱徽. 加拿大英语文学简史[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167.
- [4] 刘意青. 存活斗争的胜利者[J]. 外国文学研究,2012(1):153.
- [5] 艾丽丝·门罗. 亲爱的生活[M]. 姚媛,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
- [6] 凤凰网文化张悦然:门罗是“主妇作家”写人类普遍的微小的感情[EB/OL]. [2013-10-11]. [http://culture.ifeng.com/huodong/special/2013nobel/content-3/detail\\_2013\\_10/11/30206603\\_0.shtml](http://culture.ifeng.com/huodong/special/2013nobel/content-3/detail_2013_10/11/30206603_0.shtml).
- [7] George Hancock. An Interview with Alice Munro [J]. *Canadian Fiction Magazine*, 1982(43):102.
- [8] 艾丽丝·门罗. 好女人的爱情[M]. 殷果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 [9] 艾丽丝·门罗. 逃离[M]. 李文俊,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 [10] Linda Hutcheon. *Splitting Images: Contemporary Canadian Ironies* [M]. Toronto: Oxford UP, 1991:96.
- [11] Joe Sterling, Ben Brumfield. Canada's Alice Munro, 'master' of short stories, wins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EB/OL]. [2013-10-10]. <http://edition.cnn.com/2013/10/10/living/nobel-prize-literature/index.html>.
- [12] 傅小平. 爱丽丝·门罗:人类的关系和心理之谜,就是文学的本质[N]. 文学报,2013-10-17(02).
- [13] Robert Fulford. The Munro Woman: History as We Read It in the Stories of a Nobel Laureate[J]. *Queen's Quarterly*, 2013(4):489.
- [14] Linda Hutcheon. *The Canadian Postmodern: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Canadian Fiction* [M].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6.

责任编辑:李珂